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  
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影响*

李飞跃 张 冬 刘明兴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各地区在建国初期从革命战争中继承下来的实际政治权力的分布状况，并说明这一初始的结构特征对以后的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影响。本文从非正式政治关系的角度构建指标，度量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和中央名义制度的权威，以中国 1952—2008 年 29 个地区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方实际政治权力与中央名义制度之间的互动有助于解释地区差距的动态变化。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偏向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与其他地区并无显著差异，但从 70 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央实际权力的弱化，开始快于其他地区。

关键词: 实际政治权力 名义制度 非正式关系 经济增长

一、引言

中国的经济奇迹首先归功于东部地区的高速增长，而学界的解释主要围绕东部地区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开放中的优势展开。但如图 1 所示，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就已经高于此前的平均水平，形成扩散趋势。这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除了体制改革经济开放之外，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本文从实际政治权力（de facto political power）的角度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根源，为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提供新的解释。制度经济学指出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而

* 李飞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电子邮件：lifeiyue@nankai.edu.cn；张冬，博士候选人，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系，电子邮件：dongzhang2015@u.northwestern.edu；刘明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电子邮件：mxliu@eifrs.pku.edu.cn。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项目（71530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71273012），中央高校本科生培养质量支持项目（NKZXB1428，NKZX1110，NKZX1403），天津社会科学项目（TDJL12—008）的资助。感谢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盟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讨论会与会者的评论，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启发的建议。文责自负。
图 1 东部与中西部差距 (1952—2008)

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实际 GDP 的基期为 1978 年，样本包括 29 个地区（不包括海南、重庆与四川合并为一个地区），权重为人口。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西藏；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西藏。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由人均 GDP 的比率衡量。

图 2 本地干部比例与经济增长（分阶段）

经济制度的差异通常源于一些历史因素 (Acemoglu et al., 2001; Banerjee & Iyer, 2005)，这些历史因素通过改变政治权力分配塑造经济制度，最终影响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政治权力根据其权力基础可分为名义政治权力 (de jure political power) 和实际政治权力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两类。前者是名义政治权力的正式制度 (de jure form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而后者正式政治权力的非正式制度 (de facto inform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在制度弱化的环境 (weakly institutionalized environment) 中，实际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往往具有重要作用 (Acemoglu et al., 2005;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8)。与上述文献的思路相一致，本文将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赋予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政治权力结构 (distribution of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这使得建国后的中国地方政府虽然在名义政治制度安排层面上基本相同，但在非正式的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层面却存在着较大差异。正是这种非正式的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差异，才使得地方官员在同一政治制度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由此导致了经济发展绩效的区域差异。图 2 给出我们主要的观察，建国后第一届地方政府省委会（即 1956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选举产生的省委会）的委员构成与经济绩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存在显著关系，而在 50，60 年代不显著。具体地说，一为 1969 年为界把建国后 1952—2008 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别计算人均 GDP

① 实际 (de facto) 和名义 (de jure) 的差异与非正式 (informal) 和正式 (formal) 的概念非常接近，在本文中交互使用，不做区分。
的年平均增长率，结果建国初期省委中本地干部比例高的地区（本地干部具体定义见后文），70 年代后的经济增长较其他地区快，而在 50, 60 年代并无显著差别。

这个观察引发两个问题：第一，初始的地方干部比例何以影响长期增长？第二，这种影响的显著性为何发生变化？首先，我们将说明 1956 年省常委会中本地干部比例反映出基层官员和群众在地方政权中实际政治权力的强弱，是对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的一种度量。省级官员尽管处于相同的名义政治制度下，其政治权力基础却因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差异。为确保政治生存，省级官员不得不根据其政治权力基础选择政策措施应对政治权力冲突（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他们实际的政治权力基础可以来自高层官僚，也可以源于下级官僚。当基层干部分和群众的实际政治权力较强时，省级官员的权力基础更多地来源于基层官僚的支持，会有较强的激励奉行维护本地利益的政策（刘明兴等，2013）。

其次，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在到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还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另外一个来源——名义政治制度——的强弱。当名义政治制度比较强时，省级官员的政治权力主要由中央的正式制度所规定，而不取决于基层官僚或高层官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尽管推行保护产权的经济政策能够赢得地方官僚的支持，但它所产生的激励不足，尤其在其与中央政策相悖时，地方官员公开拒绝执行中央政策会立即被地方政权中的“竞争者”拒之把柄，不利于政治生存。我们用中央委员会中政治强人（具体定义见后文）的比重来衡量中央的实际政治权力及名义制度的权威程度，发现中央实际政治权力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就开始衰减。① 如图 3 所示，政治强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从建国到 1969 年之间保持在 80%以上，从 1969 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始迅速下降，到 1979 年低于 60%，到 1989 年低于 20%。与中央实际政治权力的趋势相对应，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在 60 年代末和 80 年代末都大幅扩大。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革命战争的历史使得建国后东部地区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偏离于基层官员和群众，这种特征随着中央权威的弱化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的贡献在于识别实际政治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中国经济增长及区域差距的变化趋势提供新的解释。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还有从制度方面讨论中国经济绩效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财政联邦主义”理论（Qian and Roland, 1998）及“晋升锦标赛”理论（Li and Zhou, 2004）。

① 名义政治制度作为高层制度安排，无法依据于更上层的制度，其效力主要源自高层政治精英的实际政治权力。当高层政治精英的实际政治权力比较强时，他们所设立的名义政治制度才能有效运行。当然制度也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强化（self-enforcing）的均衡结果（Grief, 2006），但我们认为这不符合中国政治制度的具体情况。
2005；徐传亮等，2007)。这些研究都试图说明名义政治经济制度如何激励地方官员保护产权发展经济，而本文的研究则着眼于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政策及资源配置的影响，有助于说明名目政治经济制度变革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的效应。

二、实际政治权力的度量

本文借鉴中国政治的文献，利用“非正式关系” (informal relationships/connections) 来度量实际政治权力。中国政治的文献早就采用“非正式政治” (informal politics) 概念和分析框架来讨论正式政治制度与非正式关系间的互动，阐释中国政治权力的运行和政治决策的过程。它们认为整个中国政治体制带有强烈的非正式性，非正式关系成为政治影响力 (political influence) 的基础 (Pye, 1981; Yang, 1994)。各种社会关系将建立在不同层级和利益的各种团体以聚合成组织，能够增强团体行动能力，从而形成实际的政治权力 (Tang, 1995; Chwe, 2000)。尽管非正式政治很重要，但它的形成高度依赖于正式的组织体制，正式职位是实际权力的基础，因此在工作中累积起来的社会关系对实际政治权力的影响比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都显著 (Dittmer, 2002; Shih, 2008)。鉴于工作经历的重要性，本文依据政治精英的工作经历刻画其实际政治权力。

图 4：解放后第一届省会的本地干部比例

1. 解放后第一届省会的本地干部比例

中共八大于 1956 年召开，与此同时各省也在 1956 年前召开省会，产生解放后第一届省会常委。根据省会代表的简历，考察他们与任职地区的政治联系，把自民国战争爆发到该地区被解放前一年在当地有工作经历的干部，称为“本地干部”①。这一人员构成之所以能够度量各地的实际情况政治权力结构，主要是因为解放后第一届省会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它既反映出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各种权力政治，也为新中国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从历史上看，第一届省会的本地干部比例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密切相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地区，本地干部比例通常比较高。除陕甘宁边区外，党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华北地区有晋察冀（北岳、冀中、冀热辽）、晋冀鲁豫（晋冀豫、冀鲁豫、冀南）、山东（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晋绥（山西西北、绥远东南）等区，华中地区有苏北、淮北，苏中、淮南，苏南、皖中，鄂豫皖、浙东等区，华南有东江和琼崖等区。② 图 4 显示，曾经有革命根据地的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地区，本地干部的比例高于 80%；而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如上海、云南、贵州和青海等地区，本地干部的比例远低于 80%。③

①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中区派一批干部进入了一些省份配合野战军的解放工作，这些干部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在一些地区才有了工作经历，不应算作“本地干部”。因此，我们考虑每个省份被解放前一年的工作经历。

② 见《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第 242 页。
地干部比例为 0。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基层干部和群众经过战争的考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武装力量，实际政治权力较强。在解放战争中这些地区通常由当地的武装力量解放并接管了新政权，新政权中外来干部相对较少。相反，如果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建立根据地，本地武装力量相对较弱或不存在，这些地区在解放战争中通常由外来的野战军解放，并被军队留下的干部接管，新政权中外来干部较多。解放后第一届委员会，作为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受到基层政权干部结构的影响。这样，“本地干部”在省级会议上发言的多少显示出基层官员及群众的实际政治权力的强弱，“本地干部”比例越高，意味着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更偏向于基层干部和群众。

更重要的是，原始的实际政治权力结构能够自我强化，保持稳定。由于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个体和基础性的作用，当本地干部占据优势时，他们倾向于提拔与自己有工作联系或与已有相似背景的干部作为政治权力的接班人，强化原始的网络关系，利用正式的制度框架巩固其实际政治权力。此外，他们还可以把工作关系嵌入到其他社会关系中，如血亲、姻亲、干亲、同乡、同学等等，扩大原始网络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并实现网络关系的代际传递。非正式网络关系的自我强化能力，导致原始的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持续发酵，而表现形式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隐蔽。

2. 中央委员会中政治强人的比重

我们把中央委员会中兼具文职和武职工作经验的中央委员看作“政治强人”①。由于文职和武职的差异很大，兼具两种经历的委员不仅在两个系统内建立非正式政治联系，而且在精英网络中扮演“桥梁”的角色，中心地位，拥有更强的实际政治影响力。②中央委员会中政治强人的比重越高，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它的集体行动能力越强，中央实际政治权力越强。当然，政治精英存在个体的异质性，尤其是政治领袖的实际政治权力比较突出，对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比较大（Jones & O'liken, 2005），但我们也认为名义政治制度的权威更多地来自中央最高决策机关——中央委员会——整体的而非某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通过中央委员会整体的而不是政治领袖个人的非正式关系来代表中央实际政治权力，以实现更加全面稳定。

政治强人比重的变化同样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这一比重在1955年达到历史最高点，超过80%，中共八大后略微下降，然后维持稳定。中共九大、十大期间大量无军人生经历的工农兵代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替换具有武装革命斗争经历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比重明显下降，不足50%。“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开展，一批具有革命经历的领导干部回到中央委员会，这一比重出现短暂的上升趋势。但随后开始新老干部的交替工作，经过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一大批在建国后成长且无军人生经历的领导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这一比重下降到不足20%。此后中央限制交叉兼职，特别是文职和武职交叉的情况，所以这个比重总体上维持了稳中略有下降的趋势。

总体来说，地方干部比例度量了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分布的结构特征，而政治强人比重通过度量中央高层实际政治权力的强弱程度，刻画了名义政治制度的权威程度。这两个指标都是从中国非正式政治的视角，基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工作经历所形成的网络关系来度量实际政治权力的分布。

① 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军事研究》，2012 年第 9 期。

②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只计算军事背景还不够体现“政治强人”的概念。比如，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 60-70 年代出现的官僚威权政体（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是军人与技术官僚结合的产物，军队授权需要依靠技术官僚来解决危机。
革命战争进程的影响因素复杂多变，这使得实际政治权力的分布具有很大的外生性，有助于我们识别它对后期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下面，我们将通过计量分析证明一个地区省会和本地干部比例越高，名义政治制度越弱，经济增长就越好。

三、实际政治权力与地方经济增长

1. 数据及来源说明

在基本回归中，我们使用的核心数据包括实际 GDP、人口以及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指标。实际 GDP 和人口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控制了地理、文化传统和西方殖民的影响。各地区地理特征用单位面积的海岸线长度衡量，数据来自各地区的统计年鉴，没有海岸线的地区赋值为零。文化传统的强弱用明清时期每百万人口的进士数来度量，明清时期的进士数取自沈登苗（1999）的研究，人口数取清代末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820 年）的值，取自梁方仲（2008）的研究。① 西方殖民的影响用人均通商口岸数度量，通商口岸数自姜涛（2006）的统计。姜涛（2006）报告了从 1843 年到 1916 年我国陆续开放的 72 个通商口岸，根据现在的地区划分，我们计算了各地区的通商口岸总数，并利用 1952 年的人口数计算各地区人均的通商口岸数。最后，我们构建了一个指标来测度每个地区的高层政治资源。具体而言，我们匹配每个省委书记与中共八大的、在中央机构任职的中央委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同的工作经历，计算每个省每个常委与多少个中共八大中央委员有非正式联系，以此来衡量每个省与中央高层的非正式政治联系。这种非正式联系可以看作该地区拥有的高层政治资源。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的工作经历来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及作者搜集的简历信息。

样本为中国 1952—2008 年 29 个地区（不包括港澳台、海南，且合并重庆和四川）。我们把1952—2008 年分为 12 个时段，除第一个时段为 1952 年和 1953 年两年外，其他时段都为五年，即第二时段为 1954—1958 年，第三时段为 1959—1963，其他时段以此类推。表 1 统计了各个指标所在的年代差异。② 人均 GDP 的对数值，与图 1 显示的趋势一致，尽管东部与中西部在上世纪 50、60 年代就存在显著差距，但均值保持在 0.3 以下，从 70 年代初开始，逐渐扩大，到 2003 年后达到 0.86。地方干部比例在东部非直辖市的均值为 0.69，在中西部的均值为 0.41，东部（包含直辖市）的地方干部比例显著高于中西部，表明东部的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更加偏向于基层干部和群众。

表 2 报告了变量间的协方差矩阵。容易看出本地干部比例与控制变量的关系都不显著，尽管与海岸线、明清进士密集度和高层政治资源呈正向关系，与人均通商口岸数呈负向关系。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对本地干部比例的解释，本地干部比例源自中国长期复杂的革命历史，外生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如我们所预期的，本地干部比例与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关系。

① 沈登苗（1999）报告了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山东、河南、直隶、四川、山西、安徽、湖北、陕西、广东、湖南、广西、云南、甘肃、贵州、辽宁的明清时期的进士总数。梁方仲（2008）报告了清嘉庆二十五年各地区的人口，包括除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和内蒙古之外的其他地区。我们匹配两个数据的方法如下：用江南的进士数除以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口总和，得到的平均值作为东三省的明清进士密度；河北、天津、北京数据赋值为直隶的值；上海赋江苏的值。这样最终得到除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和内蒙古之外 24 个地区的明清进士密度。

② 控制变量的统计描述限于篇幅没有报告。东部与中西部相比，具有更长的海岸线，更高的明清进士密集度和人均通商口岸数，更多的高层政治资源，其中海岸线、明清进士密集度和高层政治资源的东西部差异非常显著，而人均通商口岸数的差异不显著。
表1

<table>
<thead>
<tr>
<th>变量名</th>
<th>全样本</th>
<th>全样本</th>
<th>非直辖市</th>
<th>东部非直辖市</th>
<th>中西部</th>
<th>东部与中西部差异</th>
</tr>
</thead>
<tbody>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52—1953</td>
<td>5.03</td>
<td>4.92</td>
<td>4.90</td>
<td>5.02</td>
<td>4.81</td>
<td>0.27</td>
</tr>
<tr>
<td></td>
<td>(0.45)</td>
<td>(0.34)</td>
<td>(0.29)</td>
<td>(0.33)</td>
<td>(0.23)</td>
<td>(0.12)</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54—1958</td>
<td>5.28</td>
<td>5.15</td>
<td>5.11</td>
<td>5.21</td>
<td>5.05</td>
<td>0.24</td>
</tr>
<tr>
<td></td>
<td>(0.46)</td>
<td>(0.34)</td>
<td>(0.27)</td>
<td>(0.34)</td>
<td>(0.19)</td>
<td>(0.12)</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59—1963</td>
<td>5.36</td>
<td>5.19</td>
<td>5.14</td>
<td>5.25</td>
<td>5.05</td>
<td>0.30</td>
</tr>
<tr>
<td></td>
<td>(0.50)</td>
<td>(0.41)</td>
<td>(0.33)</td>
<td>(0.41)</td>
<td>(0.24)</td>
<td>(0.15)</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64—1968</td>
<td>5.41</td>
<td>5.26</td>
<td>5.22</td>
<td>5.35</td>
<td>5.13</td>
<td>0.31</td>
</tr>
<tr>
<td></td>
<td>(0.47)</td>
<td>(0.37)</td>
<td>(0.29)</td>
<td>(0.34)</td>
<td>(0.21)</td>
<td>(0.13)</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69—1973</td>
<td>5.62</td>
<td>5.45</td>
<td>5.41</td>
<td>5.58</td>
<td>5.28</td>
<td>0.40</td>
</tr>
<tr>
<td></td>
<td>(0.54)</td>
<td>(0.40)</td>
<td>(0.29)</td>
<td>(0.32)</td>
<td>(0.20)</td>
<td>(0.13)</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74—1978</td>
<td>5.81</td>
<td>5.63</td>
<td>5.59</td>
<td>5.81</td>
<td>5.43</td>
<td>0.48</td>
</tr>
<tr>
<td></td>
<td>(0.59)</td>
<td>(0.43)</td>
<td>(0.32)</td>
<td>(0.33)</td>
<td>(0.20)</td>
<td>(0.13)</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79—1983</td>
<td>6.15</td>
<td>6.00</td>
<td>5.95</td>
<td>6.19</td>
<td>5.79</td>
<td>0.50</td>
</tr>
<tr>
<td></td>
<td>(0.56)</td>
<td>(0.40)</td>
<td>(0.29)</td>
<td>(0.27)</td>
<td>(0.18)</td>
<td>(0.12)</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84—1988</td>
<td>6.60</td>
<td>6.47</td>
<td>6.42</td>
<td>6.71</td>
<td>6.23</td>
<td>0.56</td>
</tr>
<tr>
<td></td>
<td>(0.55)</td>
<td>(0.41)</td>
<td>(0.32)</td>
<td>(0.25)</td>
<td>(0.20)</td>
<td>(0.12)</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89—1993</td>
<td>6.92</td>
<td>6.82</td>
<td>6.78</td>
<td>7.13</td>
<td>6.54</td>
<td>0.66</td>
</tr>
<tr>
<td></td>
<td>(0.56)</td>
<td>(0.44)</td>
<td>(0.36)</td>
<td>(0.25)</td>
<td>(0.20)</td>
<td>(0.11)</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94—1998</td>
<td>7.42</td>
<td>7.36</td>
<td>7.31</td>
<td>7.74</td>
<td>7.02</td>
<td>0.79</td>
</tr>
<tr>
<td></td>
<td>(0.60)</td>
<td>(0.48)</td>
<td>(0.42)</td>
<td>(0.24)</td>
<td>(0.21)</td>
<td>(0.11)</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1999—2003</td>
<td>7.85</td>
<td>7.79</td>
<td>7.74</td>
<td>8.20</td>
<td>7.43</td>
<td>0.83</td>
</tr>
<tr>
<td></td>
<td>(0.63)</td>
<td>(0.51)</td>
<td>(0.44)</td>
<td>(0.24)</td>
<td>(0.23)</td>
<td>(0.11)</td>
</tr>
<tr>
<td>人均GDP的对数值，2004—2008</td>
<td>8.40</td>
<td>8.35</td>
<td>8.30</td>
<td>8.77</td>
<td>7.98</td>
<td>0.86</td>
</tr>
<tr>
<td></td>
<td>(0.64)</td>
<td>(0.53)</td>
<td>(0.47)</td>
<td>(0.25)</td>
<td>(0.26)</td>
<td>(0.12)</td>
</tr>
<tr>
<td>本地干部比例</td>
<td>0.43</td>
<td>0.51</td>
<td>0.52</td>
<td>0.69</td>
<td>0.41</td>
<td>0.25</td>
</tr>
<tr>
<td></td>
<td>(0.32)</td>
<td>(0.33)</td>
<td>(0.33)</td>
<td>(0.26)</td>
<td>(0.32)</td>
<td>(0.12)</td>
</tr>
</tbody>
</table>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权重为人口。差谁的数值为人均GDP的对数值对东部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标准差。

表2

<table>
<thead>
<tr>
<th></th>
<th>本地干部比例</th>
<th>单位面积海岸线</th>
<th>明清进士密度</th>
<th>人均通商口岸数</th>
<th>初始人均GDP</th>
<th>高层政治资源</th>
</tr>
</thead>
<tbody>
<tr>
<td>本地干部比例</td>
<td>1</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单位面积海岸线</td>
<td>0.24 (0.22)</td>
<td>1</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明清进士密度</td>
<td>0.24 (0.25)</td>
<td>0.26 (0.22)</td>
<td>1</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人均通商口岸数</td>
<td>-0.14 (0.47)</td>
<td>0.07 (0.73)</td>
<td>0.55</td>
<td></td>
<td></td>
<td></td>
</tr>
</tbody>
</table>

51
表2

<table>
<thead>
<tr>
<th></th>
<th>本地干部比例</th>
<th>单位面积海岸线</th>
<th>明清进士密度</th>
<th>人均通商口岸数</th>
<th>初始人均GDP</th>
<th>高层政治资源</th>
</tr>
</thead>
<tbody>
<tr>
<td>初始人均GDP</td>
<td>0.06</td>
<td>0.16</td>
<td>0.46</td>
<td>0.36</td>
<td>0.36</td>
<td>1</td>
</tr>
<tr>
<td></td>
<td>(0.75)</td>
<td>(0.39)</td>
<td>(0.02)</td>
<td>(0.05)</td>
<td>(0.05)</td>
<td></td>
</tr>
<tr>
<td>高层政治资源</td>
<td>0.09</td>
<td>-0.60</td>
<td>-0.22</td>
<td>-0.23</td>
<td>-0.38</td>
<td>1</td>
</tr>
<tr>
<td></td>
<td>(0.65)</td>
<td>(0.00)</td>
<td>(0.30)</td>
<td>(0.23)</td>
<td>(0.04)</td>
<td></td>
</tr>
</tbody>
</table>

表3 报告了按时期统计的名义政治制度的强度程度。在1969年之前，中央委员会中政治强人的比重基本保持在80%以上，而在1969年之后迅速下降，上世纪整个70年代这一比重不超过40%。改革开放后，这一比重继续下降，从80年代初的0.47下降到90年代初的0.13，到本世纪初已低于10%。

表3 政治强人比重

<table>
<thead>
<tr>
<th>序号</th>
<th>时期</th>
<th>政治强人比重</th>
<th>序号</th>
<th>时期</th>
<th>政治强人比重</th>
</tr>
</thead>
<tbody>
<tr>
<td>1</td>
<td>1952-1953</td>
<td>0.84</td>
<td>7</td>
<td>1979-1983</td>
<td>0.47</td>
</tr>
<tr>
<td>2</td>
<td>1954-1958</td>
<td>0.82</td>
<td>8</td>
<td>1984-1988</td>
<td>0.24</td>
</tr>
<tr>
<td>3</td>
<td>1959-1963</td>
<td>0.81</td>
<td>9</td>
<td>1989-1993</td>
<td>0.13</td>
</tr>
<tr>
<td>4</td>
<td>1964-1968</td>
<td>0.81</td>
<td>10</td>
<td>1994-1998</td>
<td>0.11</td>
</tr>
<tr>
<td>5</td>
<td>1969-1973</td>
<td>0.56</td>
<td>11</td>
<td>1999-2003</td>
<td>0.10</td>
</tr>
<tr>
<td>6</td>
<td>1974-1978</td>
<td>0.50</td>
<td>12</td>
<td>2004-2008</td>
<td>0.09</td>
</tr>
</tbody>
</table>

地方官员的目标是确保政治生存，最大化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基础包括名义和实际两个方面，因此地方官员的激励不仅来自名义政治制度，也取决于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各地区的官员对于统一的名义政治制度下，地区间的差异很小；但在实际政治权力方面却因革命战争经历的不同而存在广泛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展经济的激励自然也会不同。首先，由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利益与本地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紧密，他们的实际政治权力越强，那些维护本地经济利益的上级政策越容易得到贯彻和实施；其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实际政治权力比较强时，省级官员不得不寻求基层官员的支持，制定和执行保护本地利益的政策，若不顾本地利益摄取资源将破坏他们自身的政治权力基础，在可能的政治冲突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最后，省级官员与基层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有助于共同防范政治风险，保持本地区的政治稳定，提高政策的可信性。

2. 理论假说

地方官员的目标是确保政治生存，最大化的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基础包括名义和实际两个方面，因此地方官员的激励不仅来自名义政治制度，也取决于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各地区的官员对于统一的名义政治制度下，地区间的差异很小；但在实际政治权力方面却因革命战争经历的不同而存在广泛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展经济的激励自然也会不同。首先，由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利益与本地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紧密，他们的实际政治权力越强，那些维护本地经济利益的上级政策越容易得到贯彻和实施；其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实际政治权力比较强时，省级官员不得不寻求基层官员的支持，制定和执行保护本地利益的政策，若不顾本地利益摄取资源将破坏他们自身的政治权力基础，在可能的政治冲突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最后，省级官员与基层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有助于共同防范政治风险，保持本地区的政治稳定，提高政策的可信性。

1. 改革开放前，中央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处于次要地位，此时地方实际政治权力越弱的地区越能够抵挡阶级斗争的冲击，保持政权，维持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央的主要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改革仍然是有风险的，此时实际政治权力越强的地区，越能突破禁区采用有利经济发展的政策。

2. 改革开放后，中央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处于次要地位，此时地方实际政治权力越强的地区越能够抵挡阶级斗争的冲击，保持政权，维持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央的主要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改革仍然是有风险的，此时实际政治权力越强的地区，越能突破禁区采用有利经济发展的政策。

3. 当名义政治制度弱化时，对地方官员的政治生存来说实际政治权力比名义政治权力更重要，它能够确保地方政策的执行和经济的发展。
要，他们的经济政策与其实总治利益更加一致。

4) 在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实际政治影响力比较强的地区，地方官员倾向于推行保护本地利益的制度和政策。

我们预期地方实际政治权力与名义政治制度间的互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具体地，认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政治强者比重较高时，中央实际政治权力比较强，名义政治制度的权威比较高。地方干部比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当政治强人的比重比较低时，地方干部比例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快。下面是对理论假说的检验。

3. 基本结果

先对比上世纪50, 60年代和70年代之后的经济绩效，检验地方实际政治权力是否有助于解释东部和中西部从70年代初开始的发散趋势。我们借鉴Acemoglu et al. (2005b)的计量方法，采用一个有弹性的时间框架，允许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增长效应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方程式为

$$ GDP_t = \beta_0 + \delta_t + \sum_{j=1}^{k} \beta_j \cdot PL_j \cdot d_t + \lambda \cdot \phi + \epsilon $$

其中 $\beta_j$ 代表 $j$ 地区 $t$ 时期的人均 GDP 的对数值，$d_t$ 表示时间效应，$\delta_t$ 表示地区效应，$PL_j$ 是对地区非正式权力的测度，$\lambda$ 是控制变量，$\epsilon$ 是扰动项。系数 $\beta_j$ 的被量了在 $t$ 期与1969年之前相比的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增长效应。方差为稳健性方差。

表 4

<table>
<thead>
<tr>
<th>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经济增长</th>
</tr>
</thead>
<tbody>
<tr>
<td>(1)</td>
</tr>
<tr>
<td>**</td>
</tr>
<tr>
<td>全样本</td>
</tr>
<tr>
<td>----------</td>
</tr>
<tr>
<td>**</td>
</tr>
<tr>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时段 1969—1973</td>
</tr>
<tr>
<td>(0.12)</td>
</tr>
<tr>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时段 1974—1978</td>
</tr>
<tr>
<td>(0.10)</td>
</tr>
<tr>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时段 1979—1983</td>
</tr>
<tr>
<td>(0.08)</td>
</tr>
<tr>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时段 1984—1988</td>
</tr>
<tr>
<td>(0.07)</td>
</tr>
<tr>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时段 1989—1993</td>
</tr>
<tr>
<td>(0.08)</td>
</tr>
<tr>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时段 1994—1998</td>
</tr>
<tr>
<td>(0.11)</td>
</tr>
<tr>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时段 1999—2003</td>
</tr>
<tr>
<td>(0.12)</td>
</tr>
<tr>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时段 2004—2008</td>
</tr>
<tr>
<td>(0.15)</td>
</tr>
<tr>
<td>$r^2$</td>
</tr>
</tbody>
</table>

B：结构方程

<table>
<thead>
<tr>
<th>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中央正式制度</th>
<th>–0.64***</th>
<th>–0.70***</th>
<th>–0.70***</th>
<th>–0.11</th>
</tr>
</thead>
<tbody>
<tr>
<td>(0.11)</td>
<td>(0.11)</td>
<td>(0.23)</td>
<td>(0.11)</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N$</td>
<td>348</td>
<td>312</td>
<td>108</td>
<td>204</td>
</tr>
<tr>
<td>$r^2$</td>
<td>0.98</td>
<td>0.98</td>
<td>0.99</td>
<td>0.99</td>
</tr>
</tbody>
</table>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下标为回测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代表 $p < 0.1$，**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
表 4 的 A 部分报告了基础回归的结果。第 1 列报告了全样本的结果，从 1969 年到 2008 年，本地干部比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是正向的，而且越来越显著。举例来说，在 1994—1998 年时期为 0.43，这表明本地干部比例提高—单位将导致 1994—1998 年时期的均 GDP 水平比 1992—1996 年时期的水平提高 43%。一个简单的估计有助于展示这个数值对区域差距的意义。根据表 1，1994—1998 年期间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平均为 0.79，而在 1969 年之前大概为 0.3，可以计算两个地区的增长率差异为 0.49, 其中干部比例解释的偏贡献为 0.11(0.25 x 0.43)，比重为 22%。第 2, 3, 4 列分别将样本限定为非直辖市地区（排除北京、天津和上海），东部（非直辖市）和中西部。第 2 列显示在非直辖市地区 β 的数值和显著性都提高了, 第 3 列和第 4 列的结果显示, 在东部地区内部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的影响显著且高于全样本的情形, 但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比较弱, 且不显著。

在初步结果的基础上，为检验地方实际政治权力作用机制，我们修改方程(1)，引入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中央正式制度的交互项，得到结构方程

$$GP_d = d_i + \delta_i \beta \cdot Pl + \lambda \cdot F_i + \chi \cdot \phi + \epsilon_i$$  (2)

其中，$Pl$ 为政治强人比重，代表中央正式制度的强弱。系数 β 代表了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随中央正式制度的权威而变化。根据我们的假说，当名义政治制度的权威更强时，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的作用就小，因此我们预期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中央正式制度呈反向关系，即预期 $\beta < 0$。

表 4 的 B 部分报告了结构方程的结果，容易发现 β 显著为负，意味着当名义政治制度的权威比较强时，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弱。另外，结构方程与一般设定的结果一致，在全样本、非直辖市样本及东部地区样本，β 显著为负，但在中西部地区结果则偏向不显著。

4. 隐性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表 5 在基础回归中加入其它竞争性假设所强调的因素，为简化起见，仅报告了结构方程的结果。首先，经济开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有利于吸引 FDI，同时沿海地区面临更大的市场，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也都有利于产业聚集和技术进步。为控制地理因素的影响，我们用各地区的单位面积的海岸线长度来量其潜在的开放程度，方程(2) 中加入单位面积的海岸线长度与 1979 年后各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表 5 的第 1 列显示地理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但不影响地方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系数仍然是负向显著的。其次，学界从东亚经济的成功中总结出儒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儒家文化强调勤劳、节俭、家庭责任感、重视知识、重视信义、重视秩序，这会产生高储蓄、良好的教育基础、完善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 (Ming-Yih, 2010)。为控制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们用明清人均进士数来代表儒家文化传统的水平。表 5 的第 2 列加入明清人均进士数与 1969 年之后各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我们发现文化因素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的影响依然显著。最后，一些学者指出西方的殖民侵略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殖民者开辟的通商口岸作为它们侵略和掠夺的基地和跳板，在倾销工业产品、输出资本、宣扬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的状态，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陈振江，1991）。为区别于这个解释，我们用人均的通商口岸数来代表西方的殖民冲击，在表 5 的第 3 列加入人均通商口岸数与 1969 年之后各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结果显示西方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的影响依然符合理论预期。表 5 的第 4 ～7 列采用多种方式控制其他增长因素，结果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后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保持负向显著，受到的影响很小。

① 地理和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正向的，而西方殖民冲击的影响是负的，文章没有报告具体的数值。

54
### 表 5
稳健性检验（全样本）

<table>
<thead>
<tr>
<th></th>
<th>(1)</th>
<th>(2)</th>
<th>(3)</th>
<th>(4)</th>
<th>(5)</th>
<th>(6)</th>
<th>(7)</th>
</tr>
</thead>
<tbody>
<tr>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td>
<td>-0.43***</td>
<td>-0.61***</td>
<td>-0.61***</td>
<td>-0.43***</td>
<td>-0.38***</td>
<td>-0.49***</td>
<td>-0.25***</td>
</tr>
<tr>
<td>结构 × 中央正式制度</td>
<td>(0.09)</td>
<td>(0.13)</td>
<td>(0.11)</td>
<td>(0.09)</td>
<td>(0.09)</td>
<td>(0.14)</td>
<td>(0.10)</td>
</tr>
<tr>
<td>地理 × 时间虚拟变量 p 值</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r>
<tr>
<td>文化 × 时间虚拟变量 p 值</td>
<td>[0.8523]</td>
<td>[0.9665]</td>
<td>[0.3889]</td>
<td>[0.0484]</td>
<td>[0.0543]</td>
<td>[0.0037]</td>
<td>[0.2200]</td>
</tr>
<tr>
<td>西方殖民冲击 × 时间虚拟变量 p 值</td>
<td>348</td>
<td>288</td>
<td>348</td>
<td>288</td>
<td>348</td>
<td>288</td>
<td>288</td>
</tr>
<tr>
<td>N</td>
<td>0.99</td>
<td>0.99</td>
<td>0.98</td>
<td>0.99</td>
<td>0.99</td>
<td>0.99</td>
<td>0.99</td>
</tr>
</tbody>
</table>

注：同上表。

### 四、对作用机制的进一步解释

下面我们进一步识别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区别于从名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角度分析地方官员激励的假说，发现实际政治权力具有独立的作用机制。

1. 地方实际政治权力与晋升锦标赛

“晋升锦标赛”理论强调名义政治制度的作用，中央利用其掌握的名义政治权力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沿着晋升锦标赛的思路，本文假说的一个可能的怀疑是，若实际政治权力比较强的地方官员更容易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他们发展经济的激励也会比较强。我们有两条证据支持我们的假说。第一，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央政策重心才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而对地方官员经济绩效的正式考核在 80 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陶然等，2010）。而表 4 的结果显示，在 1969—1978 年间，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的作用已经发挥，这显然不是通过晋升锦标赛发挥作用的。第二，我们考察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否受到地方高层政治资源的影响。晋升锦标赛理论和本文的假说对于这一影响具有相反的预期。如果晋升的核心标准为经济绩效，那么高层政治资源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政治联系应该不直接影响官员的晋升，或者高层政治资源提高地方官员的实际政治权力，间接增加地方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的概率，提高其发展经济的激励。因此晋升锦标赛理论预期在高层政治资源比较少的地区，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尤显著差异或者比较强。而本文的假说则认为地方政治资源与高层政治资源同为实际政治权力的基础，可以互相替代，如果地方官员具有较多的高层政治资源，那么他们可以更多地依赖高层官员的支持来维持其政治前途，而不用特别重视本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利益，这导致他们在政策上对上不对下，不能切实地执行保护产权的政策。因此，我们预期在高层政治资源比较少的地区，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比较弱。为区分两种机制，我们修改方程 (2)，加入高层政治资源与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和中央正式制度的交互项，得到

\[
CDP_j = d_i + \delta_j + \beta \cdot PL_i \cdot FI_j \cdot \gamma \cdot PL_i \cdot FI_j \cdot PC_j + \sum_{j\neq i} \lambda_i \cdot PC_j \cdot d_i + X_i \phi + \epsilon_j
\]

其中，\(PC_j\) 为地区 j 的高层政治资源，\(\lambda\) 度量了高层政治资源的独立作用。若 \(\gamma > 0\)，与 \(\beta\) 的符号相反，意味着高层政治资源限制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 \(\gamma < 0\) 意味着促进。
表 6
高层政治资源、地方实际政治权力与经济增长

<table>
<thead>
<tr>
<th>富有</th>
<th>实际政治权力 × 中央正式制度</th>
<th>（1）</th>
<th>（2）</th>
<th>（3）</th>
<th>（4）</th>
<th>（5）</th>
<th>（6）</th>
</tr>
</thead>
<tbody>
<tr>
<td></td>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 × 中央正式制度</td>
<td>-0.70***</td>
<td>-1.40</td>
<td>-2.00***</td>
<td>-3.47***</td>
<td>-4.33***</td>
<td>0.11</td>
</tr>
<tr>
<td></td>
<td>地方实际政治权力 × 中央正式制度 × 局域政治资源</td>
<td>0.08</td>
<td>0.17*</td>
<td>0.32***</td>
<td>0.44***</td>
<td>0.09</td>
<td>0.10</td>
</tr>
<tr>
<td></td>
<td>基层政治资源 × 时间虚拟变量 p 值</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72]</td>
<td>[0.2990]</td>
<td>[0.1864]</td>
<td>[0.0020]</td>
</tr>
<tr>
<td></td>
<td>地理 × 时间虚拟变量 p 值</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r>
<tr>
<td></td>
<td>文化 × 时间虚拟变量 p 值</td>
<td>[0.7917]</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r>
<tr>
<td></td>
<td>西方冲击 × 时间虚拟变量 p 值</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d>[0.0000]</td>
</tr>
<tr>
<td>N</td>
<td>348</td>
<td>348</td>
<td>348</td>
<td>348</td>
<td>288</td>
<td>288</td>
<td></td>
</tr>
<tr>
<td>r2</td>
<td>0.98</td>
<td>0.99</td>
<td>0.99</td>
<td>0.99</td>
<td>0.99</td>
<td>0.99</td>
<td></td>
</tr>
</tbody>
</table>

注：同上表。

表 6 报告的回归结果支持我们的假设。第 1 列只考虑基层政治资源的作用，我们会发现基层政治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是显著的，因此在后面的回归中控制基层政治资源的影响。第 2 列在控制基层政治资源的情况下检验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与表 4 中第 1 列 B 部分的结果相比，系数 β 的符号相反，绝对值变大，表明控制基层政治资源之后，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更显著。第 3 ～ 6 列加入地方实际政治权力与基层政治资源的交互项，结果显示 γ 的符号都为正，这意味着基层政治资源限制而非促进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支持本文的假说。对比第 3 列和第 4 列的结果，容易看出控制地理因素后，γ 的数值和显著性都提高，这是因为基层政治资源与海岸线呈负向相关关系，而海岸线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关系，若不控制海岸线的增长效应，将低估基层政治资源的限制作用。第 5 、 6 列增加控制变量，β 和 γ 的数值和显著性进一步提高。

2. 正式制度的权威与正式制度的经济分化

“经济分化”文献认为经济分化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决策空间，能够约束并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下面将检验地方实际政治权力是否通过经济分化发挥作用，以澄清本文的假说。在我们所考察的期间内中央有三次大的经济分化共六次政策变化，从集权到分权或从分权到集权。利用这六次制度变化，我们通过比较政策变化前后两个相邻时段的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识别经济分化的效应。具体地说，我们修改(2)，加入地方实际政治权力与经济分权的互动。

\[
CDP_\beta = d_i + \delta_j + \eta \cdot PL_j \cdot DE_s \cdot X_j \cdot \phi + \varepsilon j
\]

其中 \( DE_s \) 为分权的变化，当 1 期有经济分权时值为 1。若交互项的系数 \( \eta \) 显著为正，表明实际政治权力通过正式制度的变迁发挥作用，经济分权有助于提高地方官员的激励，促进经济发展。表 7 报告了六次回归的结果。第 1 列为时段序号，第 2 列为时段的具体划分，第 3 列标出各个时段是否存在分权，分权为 1，集权为 0。与正式制度的具体内容相对应，第 4 列给出每个时段平均的政治强人比重，表示正式制度的权威程度。第 5 ～ 7 列分别与相邻两时段的状态，第 5 列对应第 3 列标出相邻两时段的制度变化，第 6 列对应第 4 列计算权威程度的变化，第 7 列报告回归方程 (4) 的系数 \( \eta \) 的估计值。

56
表 7 中央正式制度权威与经济分权（分阶段）

<table>
<thead>
<tr>
<th>序号</th>
<th>时段</th>
<th>经济分权</th>
<th>中央正式制度权威(平均值)</th>
<th>正式制度的变化</th>
<th>中央正式制度权威的变化</th>
<th>经济分权的效应</th>
</tr>
</thead>
<tbody>
<tr>
<td>1</td>
<td>1952—1957</td>
<td>0</td>
<td>0.83</td>
<td>第一次经济分权</td>
<td>-0.02</td>
<td>-0.09**</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0.13)</td>
<td>(0.05)</td>
<td></td>
</tr>
<tr>
<td>2</td>
<td>1958—1960</td>
<td>1</td>
<td>0.81</td>
<td>第一次经济集权</td>
<td>-0.00</td>
<td>0.03</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0.00)</td>
<td>(0.05)</td>
<td></td>
</tr>
<tr>
<td>3</td>
<td>1961—1968</td>
<td>0</td>
<td>0.81</td>
<td>第一次经济分权</td>
<td>-0.27***</td>
<td>0.20***</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0.00)</td>
<td>(0.03)</td>
<td></td>
</tr>
<tr>
<td>4</td>
<td>1969—1974</td>
<td>1</td>
<td>0.54</td>
<td>第二次经济集权</td>
<td>-0.06</td>
<td>-0.03</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0.11)</td>
<td>(0.03)</td>
<td></td>
</tr>
<tr>
<td>5</td>
<td>1975—1984</td>
<td>0</td>
<td>0.48</td>
<td>第二次经济分权</td>
<td>-0.32***</td>
<td>0.11***</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0.00)</td>
<td>(0.02)</td>
<td></td>
</tr>
<tr>
<td>6</td>
<td>1985—1993</td>
<td>1</td>
<td>0.16</td>
<td>第二次经济集权</td>
<td>-0.06***</td>
<td>-0.22***</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0.00)</td>
<td>(0.02)</td>
<td></td>
</tr>
<tr>
<td>7</td>
<td>1994—2008</td>
<td>0</td>
<td>0.10</td>
<td>第二次经济先</td>
<td>-0.02</td>
<td>-0.22***</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0.00)</td>
<td>(0.02)</td>
<td></td>
</tr>
</tbody>
</table>

注: 中央正式制度权威的指标为政治强人比重，取每个时期的平均值。权威变化的指标是通过政治强人比重对经济分权的虚拟变量作 OLS 回归，得到虚拟变量的系数及标准差。

观察表 7 第 7 列容易看出 η 有统一的模式，时正时负，时而显著时而不显著，这表明地方实际政治权力没有通过经济分权发挥作用。而对比表 7 的第 6 列和第 7 列，可以看出正式制度权威程度是决定 η 表现的关键因素。首先，在实施经济分权时若伴随着中央正式制度显著弱化，则经济分权的效应显著为正。例如在第二次经济分权，中央正式制度的权威程度从分权前的 0.81 下降到 0.54，显著下降了 0.27，与之相对应 η 为 0.20。其次，在实施经济集权时若伴随着中央正式制度的权威程度显著下降，则经济分权的效果为负。例如在第三次经济集权时，尽管中央正式制度的权威程度从经济集权前的 0.16 下降到 0.10，此时 η 为 -0.22，这意味着经济集权后，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总之，不论正式制度变革的方向如何，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的作用都取决于正式制度的权威程度是否发生协同变化。

五、结 语

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但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从何而来，仍存争议。有别于从正式制度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文献，本文从实际政治权力的角度解读地方官员的激励，通过追踪革命战争对省级政权结构的影响，基于政治精英的非正式网络关系，度量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区域差异和中央正式制度的强弱，并从实证上证明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对经济绩效存在长期影响。此外本文也揭示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对建国后的经济运行可能具有广阔深远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挖掘。当然，中国的政治经济现象极为复杂，我们的研究只是一个探索性的尝试，未来的工作还需要更为细致地分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政治间的联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等问题。

参考文献
赛伐. 黄晓. 2000.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 《经济研究》第 10 期。
陈振江. 1991. 《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 《近代史研究》第 1 期。
高华. 1998. 《北京政变与地方——阅读《江青回忆录》》. 《二十一世纪》四月号第四十六期。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2010.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李飞跃等：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影响

第 5 期。

文献：

刘方舟，2008：《中国历代户口、田地、赋税统计》，中华书局。

林毅夫，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 3 期。

刘瑞明，2011：《所有制结构、增长差异与地区差距：历史因素影响了增长轨迹吗？》，《经济研究》第 2 期。

刘金inline, 张冬，钱智，王乔，2013：《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及经济影响》，《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施春雪，2009：《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第 11 期。

陶然，陈振彪，陆剑，朱贤锋，2010：《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第 12 期。

武月，1995：《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徐规祥，舒元，2004：《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变（1978—1998）》，《经济地理（季刊）》第 3 期。

徐规祥，王肯辉，舒元，2007：《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 9 期。

张立，高远，2007：《官员任期、异质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经济研究》第 11 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2：《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中央党史出版社。


Grief, Avner,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58
Distribution of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Long-run Effect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Li Feiyue*, Zhang Dongb and Liu Mingxingc
(a; Nankai University; b;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c;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e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for each reg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ate as the heritage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and show that this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local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has long-run impacts on subsequent economic growth. We measure the local and central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in terms of informal relationships, and test our hypothesis by using a sample of China’s 29 provinces from 1952—2008. We fin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and efficacy of formal institutions explains the dynamics of regional disparity among regions. Regions where initial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was biased towards grass-roots cadres and other elites, performed with no difference before the early 1970s, but since then started growing at higher rates after a sudden drop in efficacy of de jure institution.

Key Words: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De Jure Institution; Informal Relationships/Connections; Economic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N15, O10, P16, R11


Sun Guofeng and Cai Chunchun
(People’s Bank of China)

Abstract: A notable hysteretic downward movement of the interest rates was observed when the money market rates underwent big fluctuations in 2013, which was hard to be expl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liquidity 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diversification of banks, the uncertainty of shocks and the inadequate availability of central bank liquidity support, formulates an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incorporating money market interest rates, the liquidity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central bank liquidity management, and also conducts empirical studies based on Chinese data to reach the conclusion: once the money market rates breach the reasonable upper limit,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immediately supply massive liquidity up to the threshold to bring down the interest rates instantly. And the central bank can use the 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 (SLF) as an appropriate interest rate policy instrument to directly regulate money market rates, thus requiring enhanced transparenc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SLF.

Key Words: Money Market Rates; Supply and Demand of Liquidity; Central Bank, Liquidity Management

JEL Classification: E43, E52, G10

(责任编辑:唐寿宁)(校对: 梅子)